

新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协同育人： 内涵特征、逻辑演变与路径选择

田贤鹏 姜淑杰

摘要：新文科的深层本质是跨学科的知识协同与整合，目的在于回应传统文科教育的时代局限、推动文科人才培养的转型创新发展。推动学科制度与资源的整合，致力于打造网格化、立体化的组织结构方式，实现以交叉融合为基础的跨学科协同育人质量提升是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趋势。在“学科中心论”的主导语境下，促进新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协同需要遵循从“专业化割裂”到“系统化重组”的知识整合、从“单学科中心”到“靶向性融合”的课程统整、从“行政化驱动”到“自主性生成”的学科制度调整、从“单体式推进”到“集群化协作”的平台保障支持的逻辑转变。结合现阶段的实践矛盾以及未来人才培养模式转型要求，相关改革需致力于提升跨学科机构协同育人合力、重塑多元参与的基础性制度功能，拓展二级学院协同参与的自主权限、激发协同育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设置模块化、创新协同育人的内容供给模式，打破传统学科知识边界的思维局限、释放评估考核的激励功能。

关键词：新文科；跨学科；协同育人；机制整合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2.21.013

古典教育时期，以人文经典、哲学宗教为基础的文科教育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性地位，被认为是成人成事必不可少的核心构成部分。但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大生产以后，文科就开始在与机器、技术等有关硬学科的较量中走向了衰落，而文艺复兴运动则是文科蓬勃发展进程中的一座新高峰。近现代以来，文科的地位不断受到实用主义思想的挑战，“文科无用论”思潮的影响愈来愈深，以至于出现“废除文科”的种种发展危机。“新文科”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反思，^[1]同时也是对新时代背景下知识创新与融合发展的时代回应。尽管新文科的概念被提出以后，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关注，但关于新文科学理基础和发展路向的相关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新文科的深层本质是跨学科的知识协同与整合，目的在于回应传统文科教育的时代局限、推动文科人才培养的转型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文章以跨学科协同育人为

路径依托，深入探讨了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可能方向和选择。

一、新文科与跨学科的关系

概念从来不是单体性的存在，其总是与其他概念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科”与“跨学科”亦是如此。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演变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新文科与跨学科作为一种新概念不断受到政策文件和实践改革的频繁关注，而后作为学术话语被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理论挖掘和阐释。从深层次看，新文科与跨学科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为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教育部专门成立了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并于2020年11月3日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从概念演变看，“新文科”最早出现在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之中，而后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新文科首次出现是作为一种政策话语，但

田贤鹏 姜淑杰 /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 (无锡 214122)

却并非偶然,而是传统文科教育发展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有着深层次的思想基础和学理支撑。从根本上看,学科是知识生产积累到一定阶段的制度化产物,传统文科主要以文学、历史学、法学等制度化学科为基础组合而成,致力于探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机制与规律。但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领域的愈加精细化,这种有着严格知识边界传统学科化制度弊端愈来愈突显,显示出愈来愈强的危机性,新文科即是对过于强调传统学科立场而束缚问题解决的分裂式文科体系的变革回应。

一方面,跨学科为新文科建设提供理念指导和方法支持。从全球范围内看,跨学科正在作为一种新理念受到广泛关注,并且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2]美国《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2018版)》明确指出,新形式的跨学科研究正在兴起,跨机构和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3]2018年以来国内提出的“四新”建设在本质上就体现为跨学科,从实践层彰显出协同育人的新理念。新文科的本质特征在于跨学科。^[4]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时代语境下,传统以文科、理科为知识边界的人才培养模式正显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跨学科协同育人理念则应运而生,为新文科建设提供新的活力和动力。

另一方面,新文科是实现跨学科协同育人的变革要求和路径探索。吉本斯(M. Gibbons)就认为,人类的知识生产正在经历从单学科到跨学科的转变。^[5]近年来,诸多世界顶级高校也正在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美国的杜克大学^[6]和斯坦福大学^[7]是其中的典型。为了推进跨学科协同育人,不同高校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组织方式,新文科建设则是跨学科时代的中国特色方案。改革开放以来,“重理轻文”的观念在国内高校始终存在,以致于许多学者提出了“文科危机”的说法。究其缘由,就在于传统文科的人才培养被认为门槛较低,带有较强的价值立场,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新文科即是对此问题的回应。

二、新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协同育人要求及其内涵

传统文科模式以具体学科为基础、院系为中心,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受到学科边界

的束缚和制约。新文科意在打破传统文科模式的学科分裂状态,推动学科制度与资源的整合,致力于打造网格化、立体化的组织结构方式、实现以交叉融合为基础的跨学科协同育人。

(一)从新文科建设看跨学科协同育人的新要求
理解“跨学科协同育人新要求”的前提和基础在于理解“什么是新文科”。从词源分析看,“文科”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通常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高考选择时的科目,与理科相对,包括政治、历史和地理等;二是指历史、法律、政治、经济等为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根本上看,新文科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完全否定,^[8]而是建立在原有文科基础之上的补充和丰富。

一方面,要拓展传统文科的知识边界,促进文科与理科、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从传统理解上看,文科是由一系列的具体学科构成,是以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综合。在传统意义上,文科与理科、工科等其他学科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知识边界,长期与其他学科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以至于这种边界逐渐演变为知识生产创新、人才培养变革的壁垒和障碍。事实上,知识边界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化产物,所谓文科、理科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新文科建立在对传统文科知识体系过度结构化的批判基础之上,提出了知识创新重组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要重构传统文科的组织方式,推动跨学科机构的培养方式整合与办学资源整合。自学科概念诞生以来,就与组织高度关联,受到组织发展的推动和束缚。故而,在实践话语体系中常有文科类院系与理工类院系之说。从学校职能部门看,文科类院系通常归口社科处,理工类院系通常归口科技处。以院系为基本单元的结构化组织制度是知识生产领域专业化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规范化要求。但随着问题世界复杂性的不断强化,原有的组织结构体系弊端也将不断出现,新的以“新文科”为基础的组织结构体系将必然出现。

(二)基于新文科的跨学科协同育人内涵特征

从根本指向看,新文科建设与跨学科协同育人都是新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创新改革的产物,都建立在学科整合的基础之上。基于新文科的跨学科协同育人在强调文科与文科、文科与其他学科学科交

又融合基础上,落脚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以推动文科发展适应时代、国家、社会的需求。

首先,在育人理念层面,要扭转传统文理分科的知识割裂思维,拓展学科知识的多维边界,促进知识的系统化重组。传统的知识结构逻辑下,学科不断发展分化,互相之间形成愈发鲜明的界限壁垒。长期以来,不同学科内部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与生态系统,分化出不同的研究范式与人才培养模式。然而实际上,问题世界的不断复杂化正呼唤着不同学科的跨界融合。扭转文理分科的固有思维,推动文理跨界融合,实现文科专业的系统化重构,是新文科建设的首要前提。

其次,在育人实践层面,要以问题为导向,推动育人资源的创新整合,促进问题导向的新文科课程体系优化。学科边界的模糊反映在科学研究范式上,即研究应用的情境已代替建构的学科模型来确定知识的性质。^[9]传统学科伴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形成了分科治学的教学传统。然而,单学科中心的课程设置导致学生眼界狭隘、思维受限、理论务虚、社会适应性差等多方面的局限。以问题应用为导向,以科研项目课题等为纽带,推动“文科+X”的跨学科课程整合,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也是新文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要求与目标所在。

最后,在育人保障层面,要回应传统单科式人才培养的模式弊端,构建多元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机制。跨学科协同育人需要多主体参与、多学科融合,满足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改革诉求。而跨学科机构平台作为打破实体院系、联通校政企与各院系而存在的组织保障,被认为是汇聚人才、学科、资源的重要载体。实现跨学科协同育人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并配套制度建设、跟进考核评估,在跨学科碰撞中进行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推动学科制度与资源的整合,致力于打造网格化、立体化的组织结构方式,实现以交叉融合为基础的跨学科协同育人是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趋势。

三、新文科背景下跨学科协同育人的逻辑演变

在以学科为主体的院系制育人模式下,跨学科协同育人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实践改革探索,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既有的人才培养格局、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促进跨

学科协同育人的实践深化需要从深层次进行系统化的机制变革。

(一)从“专业化割裂”到“系统化重组”的知识系统整合

在传统文科话语体系中,高校育人以院系分割教学资源,以专业割离知识体系,专业边界分明甚至“对立”。此种分裂式的教育体系在日趋复杂的问题世界里陷入了种种困境。推动跨学科融合协同、进行系统化的知识整合重组成为当代文科育人机制变革的应然与必然。

一方面,要实现从“固态型分科治学”到“流动性跨科融合”的转变。传统文科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分科治学的学科割裂式育人模式。^[10]然而随着实践问题的日趋复杂化与综合化,画地为牢的单一学科视界与复杂问题的解决需求产生错位。传统文科陷入愈发“形而上”的、脱离具体实践的“务虚”倾向。当今新科技革命、产业技术革命飞速发展,其在改变育人模式的同时,也拓宽着文科研究的场域、激发起研究范式革命,提出一系列亟需解决的关系问题与挑战。在我国新时代战略背景下,聚焦数据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争夺需要强有力的高质量跨界复合型人才基底。因此,推动新文科建设,培养中国语境下的新文科人才,应首要打破专业的界限壁垒,推动跨学科知识流动融合,通过科学信息技术为文科赋能,实现文科自救、学科框架重塑与人才培养协同模式的革新。

另一方面,要实现从“传统学科逻辑”到“新型问题导向”的过渡。实现知识的系统化重组并非多学科知识的简单混合,以何种逻辑推动知识重组、实现学科重塑至关重要。学科逻辑强调学科内部知识理论的关系,但却割裂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逻辑则超越学科层面,以实践问题解决需求为导向推动不同学科知识以其显性或隐性的联系实现合理聚合。另外,从国外跨学科协同创新经验来看,跨学科研究十分注重产学研合作,目的是传递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实现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11]而我国传统文科人才就业时暴露出的社会“无用”与“不适”,已显现出文科育人模式理论素养教育与实践问题解决相脱离等缺陷所在。因此,以问题逻辑重构跨学科知识体系,从“发现问题”出发,到“解决问题”结束,凸显文科知识的实践应用性、现实关照性特

点,以有效解决传统文科在当代社会务虚而式微的滑坡问题,满足新时代社会对文科人才的需求。

(二)从“单学科中心”到“靶向性融合”的课程教学统整

分科治学是传统文科在长期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选择与结果。其表现之一便是以单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然而单学科中心的课程教学已难以回应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挑战。同时,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背景下,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促使高校不得不进行课程统整的改革探索,以期实现从“系统化专业课程”到“靶向性模块课程”的转变。

瓦斯克斯等学者提出,跨学科课程整合是以现实问题作为课程的组织中心,学科知识被融入主题模块内,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课程的内容与目标。^[12]单学科中心的课程设置是传统文科院系推进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在学科知识逻辑下,单学科中心的课程体系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教授,但教学内容相对局限、片面,看问题的学科视角也过于单一、狭隘。基于单学科课程的诸多局限以及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高校需要推进多学科融合的课程整合工作。以问题为导向是跨学科课程整合的内在逻辑,^[13]如以科研课题、研究项目、面向未来的社会重大问题为组织核心进行相关课程的整合。课程统整教学不同于以往固化的知识传授,而是围绕靶向问题,统整跨学科知识,形成可选择性的、多维度的融合模块课程。为学生提供多学科的课程内容、宽口径的研学资源,以扩展学生的广阔视野、创设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的生发点、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突出了人才培养中学以致用的应用性逻辑,能够有效改变文科人才社会适应性差、偏重理论务虚等育人现状。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文科”的本质特征是“创新”,表现形式为跨学科性、现实性与技术性。^[14]面向现实需求,推动“文科+X”科际整合是新文科建设遵循的方向。一方面,推动文科与文科、文科与信息技术、数据计算等相关课程整合,促成文科内外延知识价值激发,革新教研模式,汇聚跨学科资源实现协同育人。另一方面,聚焦市场人才需求,定位课程统整目标。伴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市场人才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就

业”的目标,已显示出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从“规模”转向“应需”、从“量”转向“质”的变化。因此,高校育人须对市场进行需求分析,精准市场定位,实现高校与市场、育人输出与市场输入的双向互动、协同育人。具体而言,高校需加强产学研一体化相关平台建设,汇聚多学科、多主体的教育资源,在保障体系内合理化划分多边利益,促进多方协同合作育人。

(三)从“行政化驱动”到“自主性生成”的学科制度调整

新文科建设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经由高校施策,需要在回应传统育人方式弊端的基础上推进育人模式的改革升级。虽然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推动具有秩序性与效率性,但灵活性与自主性也在高效管制下受到多重束缚。随着新文科建设工作的持续推进,逐步实现行政化“放管服”改革,扩大院系自主权限,推动专业调整在院系内部自主性生成是新文科建设的长效之策。

新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协同育人在现实机制层面,是由国家教育政策为行动准则,由各高校担任行动开展的角色,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化调控体系。行政化调控以国家政策为理念指引,自高校层面结合学校特色、院系专业做出顶层设计,推进跨学科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与实施,在试行阶段与工作初期保证了改革贯彻的效度。但行政化管控在无形中压制或削弱了院系的创新性与个性的发挥,成为院系新文科建设工作的禁锢。同时,一味地行政化驱动易使院系工作陷入疲态,院系内部仅“听指令做动作”,新文科建设陷入“只改不改”的表面工作。因此,为推进文科专业的交叉融合,需要下放院系的自主权,在科研教学中,基于问题导向,以研究课题项目聚合跨学科资源,根据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自主化推进学科的交叉融合。

新文科不仅要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下开疆扩土、进行跨学科实践,还要打破现有的学科窠臼,寻求一方新的天地。^[15]但“凿墙破壁”、“再立门户”并不容易。在过去院系主导下的管理与培养、课程教学中,分院系、单学科的育人模式及理念根深蒂固。加之部分人对跨学科的认同度尚不够高,跨学科专业调整易流于形式化成为表面工作。由此,改变故步自封、实现冲云破雾的关键在于院系自主性的调动与发挥。这需要高校逐步实现“放管服”的行政化

改革,加强引领与服务功能。在统筹规划、主体协调、利益分配、资源配备、平台建设、制度制定等方面为院系开展学科专业调整工作提供支持保障。院系层面需要明晰新文科建设的理念要义,正视并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工作,在专业融合、课程统整、院系开放等方面做出努力。协同推进新文科建设,产生1+1>2的实效,实现从形式化调整到实质性融合的焕然一新局面。

(四)从“单体式推进”到“集群化协作”的平台保障支持

吉本斯等认为,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背景下,“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并让位于更加开放的组织结构,在新的组织结构中各种不同的知识和竞争又以全新的方式联合或重新结合起来”。^[16]打破学科专业的藩篱,实现跨学科的通力合作,需要更加灵活、开放的组织架构。其中,既须在原有院系的组织架构上做出调整,又要建构联结汇通、虚实结合的跨学科组织。

新文科建设作为一个跨学科协同的系统性工程,包含了课程体系、师资队伍、评估考核、研究范式等多方面的调整,这决定了其需要适配性的平台体系以保障有序高效的运转。实际上,在全方位推进新文科建设之前,学科专业内部在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背景下,已经开始了自发的、小范围的、相对零散的跨学科教学与研究。如今,跨学科协同大势所趋,传统院系组织建制的重构势在必行。与此同时,跨学科协同育人也呼唤更加综合灵活的、区别于传统院系另设的组织平台,以供不同部门、院系、学科进行有序、系统、广泛的交流协作,便利具体教学研究的开展,从而实现从“零散联结”到“平台保障”的转变。

基于院系实体进行的跨学科教学研究是跨学科协同的表现形式之一。然而随着学科间融合、协作程度的加深,其愈加要求突破院系的限制与禁锢,追求更加高效自由的协作形式——跨学科机构组织应运而生。国外诸如美国等研究型大学在混合学系的重构下,设置了跨院系、跨学科界限的,以研究中心、研究所、实验室等为主要形式的跨学科平台。这些跨学科平台机构是一种区别于传统院系的组织机构,最初多以虚体的形态存在,但其运行机制却可以实现虚实交叉的高效自由协作。其目的是将跨院系

的合作人员融合在工作单元里,提供共同研究的设备。^[17]此平台围绕问题、项目、兴趣等核心需求,辐射至不同学科、院系、部门,实现高度灵活自由的聚合,汇聚多方资源,为跨学科育人活动提供保障性平台支持,由此形成流动且有序的跨学科协作集群。

四、新文科背景下跨学科协同育人的路径选择

跨学科协同育人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主体协同参与,打破既有学科界限所造成的诸多权力与利益壁垒。在新文科建设的政策驱动下,跨学科协同育人无疑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结合现阶段的实践矛盾以及未来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要求,组织层面的政府和高校以及个体层面的教师等需要共同努力,提升协同育人合力。

(一)提升跨学科机构协同育人合力,重塑多元参与的基础性制度功能

路德维格·胡贝尔曾言:“制度化背景下实现跨学科合作是比较困难的”。^[18]跨学科协同育人不同于传统院系的育人模式,其多主体、多形态、多学科等特点决定了其需要突破院系建制的禁锢、组建起多元参与的跨学科协同机构,同时结合相关的配套制度以保障支持具体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促进高校育人模式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跨学科协同育人平台机构的建设成为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

一方面,以跨学科协同机构联动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需要明确的是,传统院系设置虽相对割裂、界限封闭,但并非要彻底否定摒弃,其在行政管理与院系日常运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跨学科协同机构与院系单位制之间并非替代关系。实际上,跨学科协同机构在不影响各院系行政管理运行、弥补传统院系弊端的同时,于院系组织架构之上提供了一种开放灵活的、协调跨学科多元参与的有效形式。通过组建以虚体或实体存在的跨学科协同机构,突破学校、院系实体组织的壁垒,建立起政府统筹、校企联合、科际整合,院系、学校、国际合作的跨学科协同育人平台。在动态流动、交叉联通中,实现以问题应用为导向的教研活动与育人工作。

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跨学科协同育人的配套制度支持,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提供机制保障。多

个利益相关者进行松散的耦合协作是目前主导的多主体治理范式,^[19]而传统的组织逻辑、责任追究制度对促进复杂、多元化的合作至关重要。^[20]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机构经验包括通过激励拨款、组织结构和新的教师招聘和评估模式等举措创造了促进跨学科研究实践的组织条件。^[21]当前,高校跨学科育人陷入表面化、割裂化、难以规模化等窠臼,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编制、考核晋升依托原有院系管控,学术资源等过度倾斜院系单位,由此导致跨学科协同困难,教研热情被压制等问题。为持续推进新文科建设,聚合相关利益主体协同育人,高校需要设计并实施相关制度文件。在组织架构上需要明确责任人与领导者,出台组织建设制度、拨款投资规定、利益划分制度等,保证组织的有序运行与成果产出;在考核聘任制度上,创新改革评教制度、教师聘任制度、职称考核制度等,以充分保障跨学科协同育人长效且有序地开展。

(二)拓展二级学院协同参与的自主权限,激发协同育人的主体能动性

从已有研究看,到底是“大学的学院”还是“学院的大学”成为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落实的关键,深刻影响着二级学院跨学科协同育人的深层次格局。就我国而言,在“大学的学院”理念主导下,二级学院的自主权限相对较小、创新活动相对不足,如何实现从“大学的学院”到“学院的大学”的转变将成为实现跨学科协同育人的关键。

对于高校而言,要扩大二级学院自主权限,为跨协同育人工作“简政放权”。尽管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积极探索向院系放权、向研发团队和领军人才放权的路径,但成效并不显著。为持续推进新文科建设,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扩大二级学院自主权。首先,随着知识的整合与分化,在学科专业内部已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与生态系统,实现专业调整需要突破诸多限制。二级学院在管理上可实现精细化的制度供给和思想供给,除却学校层面的统筹推动,学院内部自主调整至关重要。其次,在以问题为导向的逻辑下,以科研课题项目为载体的学科融合、课程统整需要二级学院根据学科发展、知识特点、人才培养需求等推进,单纯靠学校层面行政化统筹难以实现。最后,破除依托院系的教师归属、学科身份、资源倾斜、学位授予等

实质性障碍,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开放兼容性的解释框架,给予院系高度灵活的自主权限,创造突破院系单位制活动的生成条件。因此,推动跨学科协同育人,实现文科育人模式的转型,需要适当“松绑”,并在制度、资源、平台层面为学院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保障。

对于政府而言,要坚持“放管结合”,为跨学科育人方式创新提供协同支持。首先,管理部门应在出台相关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基础上鼓励高校自主探索,促进高校跨学科协同育人的主体能动性提升,充分发挥高校在跨学科协同育人方面的主导性。其次,在课题项目方面加强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跨学科协同育人的引领和激励,可以通过设置新文科建设专项、跨学科协同育人专项等,强化相关领域的学理研究和实践研究。最后是鼓励教师联合聘任制、跨学科学位授予等,推动构建跨学科机构平台,加大资金投入,在设施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同时打通校内外、校企以及跨国合作的渠道和途径,为深层次学科融合,多主体协同参与创设条件。

(三)推动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设置模块化,创新协同育人的内容供给模式

跨学科协同育人如何适应和引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是高校需要攻克的突出问题。从内容供给创新的角度看,推动课程设置模块化、为学生提供基于问题导向的多元化课程选择将会成为跨学科协同育人改革的新方向。

正如韦伯(Weber E P)指出的那样:“现实世界的问题很少符合已经确定的学科所能处理的有限主题。”^[22]为回应文科式微争议、实现文科育人模式改革创新,应实现课程模块化革新,拓展学生课程选择的范围,回应现实问题的关切。模块化课程根据主体需求,定向地或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的课程内容供给。其强调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显示出人才培养较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实践应用性。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是通过“文科+X”的学科融合形式进行课程统整。因此,模块化课程设置不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育人,也强调技术赋能、学科融合。为推动课程设置模块化,一方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全球关注、国家战略、现实问题、学科发展等,构建综合化、创新性、应用性的模块化、单元式课程结构;另一方面需要重构课程体系,协调包括政府、企业、相

关学科专家等多主体参与课程设计,必要时融入相关信息技术内容和手段,致力于复合型创新应用学生的培养。

从国外相关研究实践看,“主题轴(Theme axis)”模式被认为是有效统整课程内容、推动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主题轴模式是指围绕综合性主题,对所涉及的学科内容重新整合、串联,并以课标的形式进行确立。^[23]与部分学者提出的“大概念”^[24]等用义相似。一方面,高校通过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跨学科研究机构等,以整合学科、行业、时空资源,打造跨学科、跨行业、跨实体部门、跨校跨国的课程支持系统。另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打通学科间的知识脉络与联系,在充分融入政府、社会、企业需求的基础上,面向实践应用,建构学研结合、科学合理且社会适应性强的“主题轴”课程体系。注意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能力与深层创造力,而非流于碎片化知识。同时,实现课程统整要考虑克服“结构性与文化性障碍”。^[25]因此,配套支持保障制度体系以保障跨学科合作而非形成学科间竞争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打破传统学科知识边界的思维局限,释放评估考核的激励功能

传统文科专业的考核评估以单学科知识体系的记忆考试、论文写作为主要内容,无形中切断了与其他学科以及问题实践的联系,走向单纯理论应试、脱离生活实际的尴尬窘境。其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生成、开阔眼界的打开与综合性实践能力的提升。重构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估对于新文科背景下跨学科协同育人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构建理论与实践相并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跨学科育人考核评估标准。首先,新文科的学科应用性指向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因此,对文科学生的考核评估不仅要包括理论学习、论文发表等方面,还应融入实践向度的考核。例如考核学生理论创新对问题实践的贡献度、理论应用实践的能力、实际科研成果等。其次,

新文科建设落脚于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单学科中心的考核评估已不适用,重构针对新文科的跨学科人才评价机制势在必行。评价标准需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围绕学生综合性知识与能力进行考察。最后,由于文科专业自身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成果非线性特点,加之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针对新文科的考核评估相比其他评价要复杂得多。考核评估标准的制定应注重不同培养主体的共同参与、多方主体的需求表达。具体标准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综合的评价方式,设置标准指标与弹性指标,并在试行中动态调整。

另一方面,合理运用考核评估结果,发挥评价的跨学科协同育人激励与导向功能。新文科考核评估体系的重构除却学生评价体系,还应包括关于教师、学科、其他主体的评估考核。首先要合理科学地应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估的激励作用,促进师生、院校、政企协同育人的行动自觉。其次在新文科的推进的初期阶段,明晰的评估框架对具体教学实践具有导向性作用。因此,在学生评价层面,应通过考核评估标准引导学生的学习与科研活动,并在双学位或多学位授予等方面给予激励。在教师评价层面,鼓励跨学科教学研究与文科的纵深化长效化研究,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功利性学术危机;建立教师联合聘任制,鼓励教师的跨院系交流协作等。在学科评价层面,给予学科发展以时间与空间,实行弹性评价、过程评价与长期评价机制,达到以评促建,在制度层面促进新文科健康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新文科改革与实践项目“新文科视域下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改革与实践”(20210850)、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研究”(22SYB-012)和江南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教育+’跨学科协同育人新机制研究”(JG2021064)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参考文献

- [1]李凤亮.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J].探索与争鸣,2020,(01):5-7.
- [2]郑石明.世界一流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19,40(05):113-122.
- [3]EDUCAUSE.2018 NMC HorizonReport [EB/OL].<http://distance-educator.com/2018-nmc-horizon-report/>.
- [4]赵奎英.试谈“新文科”的五大理念[J].南京社会科学,2021,(09):147-155.

- [5][17][英]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6]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t Duk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EB/OL]. [Http://interdisciplinary.Duke.Edu/about/history-strategy/history.html](http://interdisciplinary.Duke.Edu/about/history-strategy/history.html).
- [7]Stanford Interdisciplinary. Q&A with Ann Arvin, Dean of Research and Vice Provost, on Stanford's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EB/OL]. <https://interdisciplinary.stanford.edu/qaann-arvin>.
- [8]田晓明,黄启兵.论我国“新文科”建设之中国特色[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9(03):91-98.
- [9][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4.
- [10]李鹏虎.从分科治学到科际融合:“入世式学术”视野下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1):7-12.
- [11]Brown R R, D Ana, Wong T. Interdisciplinarity: How to catalyse collaboration[J]. Nature, 2015, 525(7569):315-317.
- [12]Vasquez J A, Sneider C I, Comer M W. STEM Lesson Essentials, Grades 3-8: Integrating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M].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2013.
- [13]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J].南京社会科学,2020,(07):130-135.
- [14]田晓明,黄启兵.论我国“新文科”建设之中国特色[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9(03):91-98.
- [15]孙江.跨学科与去学科:“新文科”的第一步从何处开始[J].探索与争鸣,2021,(10):13-15.
- [17]李鹏虎.美国研究型大学组建跨学科组织的背景、实践及经验[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41(06):99-105.
- [18]Huber L, Shaw G. Towards a New Studium Generale: Some Conclus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2, 27(3): 285-301.
- [19]Osborne S P.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06, 8(3): 377-387.
- [20]Alexander E R. How Organizations Act Together: 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Psychology Press, 1995.
- [21]Creso M. S. 'Interdisciplinary strategies' in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 2008, 55(5):537-552.
- [22]Weber E P.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Grassroots Ecosystem Management, Accoun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M]. MIT Press, 2003.
- [23]唐汉卫,倪羽佳.美国社会科课程统整:历程、模式和困境[J].全球教育展望,2021,50(09):63-79.
- [24]修南.面向新文科建设的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03):50-53.
- [25]Winebrake J J. The Integrative Liberal Arts and Engineering-The 'grand challenge' of Curricular Implementation[J]. Engineering Studies, 2015, 7(2-3): 193-195.

The Logic and Path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Tian Xianpeng & Jiang Shujie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Abstract: The deep essence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purpose is to respond to the era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talent training.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s and resources, striving to build a grid and three-dimens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realiz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cross-integration are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and tren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From the natural level,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we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 from professional separation to systematic reorganization, reform th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single discipline center to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ptimize the profess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from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o independent generation, and create a platform guarantee mechanism from substantive promo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In order to promote this transformation, all parties need to make efforts from four aspects: establish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of specialty adjustment and expand the independent authority of secondary colleges; Promote the ordering of curriculum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students' curriculum selection; Break the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give play to the incentive function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ntegration